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研究動機

1991 年底，葉爾欽(Boris Yeltsin)當選首任俄羅斯總統之後，就開始推動一連串激烈的經濟改革，採行「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達到經濟改革的目的，葉爾欽奉行「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的激進改革主張，對價格全面開放、改革貨幣、緊縮信貸、嚴格控制政府財政赤字、激進地推動產權私有化(privatization，國內又譯為民營化)等措施。葉爾欽推動之經濟改革基本上可說是俄國計畫經濟的結束，俄羅斯因此而由一個中央控制型態為主的經濟體，轉型到以市場經濟為主的「轉型中經濟體」(Emerging Transforming Economy)。¹但在轉型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經濟表現一直是顛簸崎嶇，其中經歷過 1994 與 1998 年的金融危機，因此各方對俄羅斯經濟轉型的評價始終褒貶不一。但無論如何，從 1998 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俄羅斯的經濟表現已逐漸轉好。到 2002 年 7 月 1 日止，俄羅斯居民的實際收入狀況要比 1998 年 8 月份爆發金融危機時高出 5.4%。其中也包括了俄國居民的黑色收入部份以及居民逃稅的部份。如果同 1998 年的 8 月份和 9 月份相比，2002 年俄羅斯居民的實際工資收入狀況增長了 18.7% 和 55%。²而從 2003 年 1 月到 8 月，俄羅斯居民的實際貨幣收入較去年同期相比又增長了 13.4%。³

反觀阿根廷，在 1984 年阿芳辛(Raúl Alfonsín)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達成協議後也開始進行經濟轉型。但國內的經濟狀況不但未獲得改善，反而每況愈下。最後終於在 1989 年國內經濟全盤崩潰。消費者月物價指數攀高至 196.6%⁴，在無

¹ 「當前俄羅斯經濟分析」，*今日經濟季刊* 327，9 (1998)，<http://www.moea.gov.tw/~ecobook/ecotoday/et372/b6.htm>。

² *大紀元* (6 August 2002)，<http://www.epochtimes.com/b5/2/8/6/n206607.htm>。

³ 「俄最新統計數字顯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加快」，*俄羅斯龍報*，<http://www.rulb.com/e-10-81.htm>。

⁴ CEPAL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http://www.eclac.cl/>。

法招架經濟的風暴之下，阿芳辛提早 5 個月下台，由下一任總統當選人美能(Carlos S. Menem)先行執政。美能接手後，便開始大膽的經濟改革：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希望能夠迅速的重建有效且不受政府干預的經濟市場。美能為了解決這迫切的經濟問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新的經濟政策，其中包括減少政府支出、增加財政收支、公營事業私有化、經濟自由化、獎勵外人投資等措施。阿根廷的經濟在新政府執政初期，曾有一段適應調整期，直到 1991 年成效逐漸顯現出來，財政收支改善，經濟成長加速、通貨膨脹也得到有效的控制。⁵自 1991 到 1998 年這 8 年間，阿根廷的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 5.8%，因此阿根廷的經濟轉型也普遍受到國際的肯定。雖說如此，但是由於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 年開始阿根廷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經濟和金融形勢持續惡化，失業率也高達 18.3%。儘管政府非常努力於防止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發生，但是 2001 年 7 月還是爆發了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證券市場發生空前規模的動盪，主要股票指數和公共債券價格暴跌，國家風險指數猛升至 1700 點以上，資金大量外流，國際儲備和銀行儲蓄嚴重下降，政府財政赤字早已突破原與 IMF 協議規定的指標。⁶經濟問題最後延伸為政治問題，不但使國內政治局勢動搖，更讓阿根廷在 2001 年年底出現了在兩個星期更換五位總統(包括原先在位的總統)的動盪局面。

本論文選擇俄羅斯與阿根廷做為比較與研究的對象是因為筆者在研讀俄羅斯經濟時，發現其經濟改革的過程與阿根廷有許多相同之處，使筆者感到阿根廷的歷史似乎換了個舞台在俄羅斯再度重演。筆者對阿根廷有所了解是因為 1986 年筆者全家移民到阿根廷，當時阿芳辛已治理阿根廷二年多，但阿根廷的經濟狀況相當的不穩定，之後，匯率變動的更是厲害；黑市猖獗，工資完全無法跟著通貨膨脹的速度調漲，因此罷工、遊行的情形不斷，因而形成了非常混亂的現象。⁷此後一直到 1989 年嚴重的經濟崩潰、美能的上任、匯率政策的施行、經濟開始好轉，筆者都親眼目睹。

在探討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轉型，筆者認為雙方在經濟轉型前有著下列的共同初始條件，因此大膽做出一個軍事威權體制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比較。

⁵ 陳進安，「阿根廷經濟概況」，*中國商銀月刊* 12，2 (1993): 1。

⁶ 楊麗明，「阿經濟不振十餘年」，*人民網* (21 Dec. 2001)，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j/23/88/20011221/632141.html>

⁷ 當時買一杯冰淇淋得帶著百萬元的大鈔，隨時得擔心手上的貨幣是否到了明天就無效。因此大家都盡量將手邊的阿幣換成美金以便保值。

兩國相同的初始條件約為：

1. 雙方皆為天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大國；
2. 由威權政體進行民主轉型與經濟轉型；
3. 轉型過程受到國際組織影響(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4.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採行；
5. 在其地理位置的區域中為經濟轉型速度最快的國家；
6. 經濟轉型前國內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
7. 轉型前政府干預國內經濟市場之程度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英)高，而且壟斷的程度也高
8. 沉重的外債負擔。

除了上述的初始條件之外，俄羅斯與阿根廷的政府在進行民主轉型的同時也必定要面臨到經濟的轉型，因此在大環境的需求之下，兩國國內的經濟開始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移動。而由於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改革藍圖都是在 IMF 的操刀下所設計出來的，便有學者認為，俄羅斯的經濟政策本質上是西方開給拉丁美洲國家經濟改革政策的拷貝，而且俄羅斯經濟改革的顧問，也是當年擔任波利維亞經濟改革的顧問；⁸因此，兩國經濟改革的內容並無太大的差異，所開出的藥方不外乎是帶領國家的經濟走向自由的市場經濟，其中包含市場化(marketization)、穩定化(stabiliz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施行。因此，無論是俄羅斯或是阿根廷都經歷了這些過程。但阿根廷在阿芳辛時期(1983~1989年)是先施行穩定化，到了美能總統時才施行私有化(1989~1999年)，而俄羅斯則是在葉爾欽的主導下齊頭並行，所以在討論兩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將發現，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穩定化都受到國內不成熟的民主政治及國際環境的影響，兩者之改革過程顯得十分雷同。而阿根廷的私有化則是到了美能時期才開始進行(參見圖 1-1)。此外在總體環境方面，俄、阿兩國的相異之處頗多，如下表所示。

在經濟轉型後的初期阿根廷的經濟已被視為是轉型成功，在其漸入軌道的同時，俄羅斯的經濟卻顛簸而行，越漸惡化。但在 1998 年金融風暴之後，又為何俄羅斯的經濟表現逐漸回穩，而阿根廷的經濟卻出現崩潰的現象？筆者以為這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但在本論文的討論中，主要將把重心放置在穩定化上，因為雖然私有化與自由化也為國家經濟轉型帶來重要的影響，但若是市場化和私有化在沒有穩定化的配合之下將導致政策的反覆無常，使任何不論是自由化或私有化的政策都無法有效的執行，而達到預期的目標；另外，一個國家的

⁸ Michel Chussudovsky, *The Globalisation of Poverty: Impact of IMF and World Bank Reforms* (London: Zed Book., 1997), p.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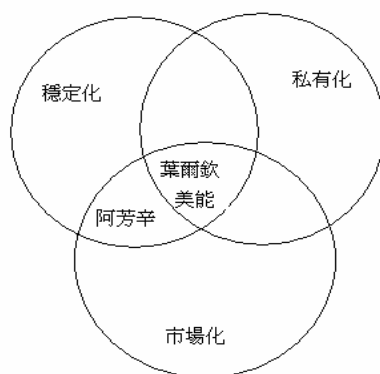


圖 1-1 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改革表象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表 1-1 俄羅斯與阿根廷總體環境的差異

比較項目	俄羅斯	阿根廷
轉型前的政權形式	前社會主義國家	前軍事威權國家
文化條件	屬於歐亞大陸的歷史、文化、人文、風俗習慣、與地理環境	屬於南美拉丁美洲的歷史、文化、人文、風俗習慣、與地理環境
	歷史上為帝國	歷史上為西班牙殖民屬地
政治體制	強勢半總統制	總統制
國會生態	多黨制	兩黨制
工會組織	虛弱	強大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經濟在僅施行穩定化而未配合財產權的改革時，依舊能有效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及財政赤字的問題，而帶動國家經濟成長。⁹所以筆者以為穩定化能為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影響較私有化和自由化更為重要，所以也將本論文的焦點專注在穩定化上。除了對穩定化加以剖析外，本文也將對影響穩定化的因素，通貨膨脹、轉型國家與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的關係及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政策與實際狀況做出更進一步的探討。

研究目的

在經過民主化的洗禮後俄羅斯與阿根廷的民主已逐漸走上軌道，而在做出民主化轉型的同時，兩國在經濟上的轉型也是必然的現象，因兩國皆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並行地做出經濟資本主義化的轉變。在華盛頓共識下俄羅斯與阿根廷開始推動經濟改革，俄羅斯採用了「震盪療法」，而阿根廷的經濟轉型中，雖然並未出現「震盪療法」的字眼來描述，但在速度上並未較俄羅斯採行震盪法的速度慢，因為阿根廷也是以一步到位的方式，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移動，以解決其嚴重的經濟問題。而且，華盛頓共識實際上就是震盪療法的理論基礎，而當年「華盛頓共識」就是針對 80 年代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危機所提出來的¹⁰，因此，在經濟改革政策的基礎上，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政策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改革政策可說是同出一轍，換湯不換藥。

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在 1998 年之前都是顛簸而行的，而阿根廷的經濟改革從 1984 年到 1991 年之前也是艱辛困難，直到 1991 年後才逐漸好轉，而且蒸蒸日上；因此普遍認為阿根廷是一個經濟轉型極為成功的例子，但在 1998 年金融風暴之後，俄羅斯的經濟逐漸好轉，但阿根廷的經濟卻逐漸轉惡。惡化的程度超乎了想像，如同排山倒海而來，導致最後股市崩盤、資金外流、貨幣貶值、政權不穩、社會動盪不安等現象。處於南美洲的阿根廷本身的自然資源頗為豐富，而且再加上其廣大的土地和許多其它轉型成功國家的借鏡，為何阿根廷的經濟會如此大起大落？阿根廷經濟崩潰後，專家們開始認為當年阿根

⁹ Manuel Hinds, "Issue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Forces in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90)轉引自 Stanley Fisher and Alan Gelb, "Issues in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es," in Vittorio Corbo, Fabrizio Coricelli and Jan Bossak, eds., *Reform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itial Result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1), p. 71

¹⁰ 周全等編著，*21 世紀的俄羅斯經濟發展戰略*（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p. 11。

廷經濟狀況的改善只是曇花一現，而且也開始質疑西方對轉型國家所開出的藥方，是否真的可以幫助經濟困難的國家擺脫危機？還是將其推向更深的淵藪？為何 1998 年之後俄羅斯的經濟表現逐漸回穩，而阿根廷的經濟卻出現崩潰的現象？到底兩國經改的環節哪裡出了錯？而兩國在執行經改的過程中又有何差異呢？

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為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過程中，穩定化對經濟轉型成果所帶來的影響。筆者大膽假設，雙方國家轉型前的政體的差異並不足以構成影響轉型成果不同的主要原因，而影響其經濟轉型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應為其執行過程中的政策的穩定性。假若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無法貫徹在進行自由化和私有化的過程中，國家隨時更改政策方向，反覆無常，那麼不但會造成自由化與私有化的政策目標無法有效落實，而且也將會帶來政治不穩及社會動盪。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主要表現包括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其中穩定化至關重要。因茨(Manuel Hinds)就曾經對“穩定化是否能在社會主義的系統下施行成功，或穩定化必須配合財產權的改革，才能帶來較好的經濟表現”一議題進行研究。他透過南斯拉夫和波蘭的例子(納入穩定國家市場的規則，伴隨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發現無論是社會主義經濟或是市場經濟，緊縮的財務和信貸政策都能減低國內的通貨膨脹和政府經常帳的赤字。¹¹因此，國家的穩定化總是能帶來成效的。¹²反之，如果一個國家只進行國營企業的私有化和市場的自由化，而沒有穩定化的配合，也將無法帶動國家經濟的成長。因此無論是俄羅斯，一個由中央的官僚體系做為協調的機制；或阿根廷，一個由國家過度干預的經濟市場，在轉型到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開放市場過程中，都相當注重穩定化施行的進程。而一個轉型國家的穩定化是否能有效執行則取決於：

- 一、 西方國際金融組織、國家政府和國會三邊的權力均衡。因為俄羅斯與阿根廷政府受到大環境的影響，國內的經濟都往穩定化的方向開始推動經濟改革。但兩國的經改藍圖主要都是由西方國家與國際金融組織所設計，而國際金融組織對新興市場的紓困方案，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哲學為基礎，提出轉型國家透過穩定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施行，推動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內開放市場，使國內經濟得到改善。但伴隨著經濟轉型而來的是生產的減少，物價的上漲、國際收支的惡化和大量的失業；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轉型國家便向國際金融組織和西方國

¹¹ Stanley Fisher and Alan Gelb, p. 71.

¹² Stanley Fisher and Alan Gelb, p. 73.

家請求援助，而在西方的壓力和救助資金的誘因下，轉型國家大多採行了新古典的經濟改革方案，結果造成西方國家與國際金融機構、政府，和反映社會上反對意見的國會之間緊張的三角關係。¹³因此在這樣的架構之下，若政府的權力相對國會與西方較強，則較能有效施行與持續穩定化的政策，而帶動國家經濟成長。這樣政經的三角關係不論是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轉型過程中，都可預見。但在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改革經驗中，他們都無法有效維持強勢政府，以推動其理想的經濟改革，實行穩定化的政策，而是不斷爲了要滿足西方的新古典經濟改革計劃，施行緊縮的貨幣和財務政策，開放市場和穩定匯率，同時又必須反映社會的要求，降低經改爲社會所帶來的陣痛，維持一定的財政開支，以尋求個人與黨的選票；最後政府爲了滿足雙方的要求，只好靠不斷的借貸來填補，使最後外債負擔過重到無法負荷的地步。¹⁴

- 二、穩定化政策產出後，國內通貨膨脹獲得控制的狀況。因爲轉型國家在施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國內通貨膨脹或多或少都會被受牽動，而過高的通貨膨脹率不但會阻礙國家的經濟發展、摧毀政府的信譽、破壞商業交易的信心和動搖國家內部的穩定，使國內經濟表現不佳，還會連帶影響西方國家對轉型國家援助的態度、目標的設定和金援的多寡，使穩定化政策無法繼續有效執行。因此，在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轉型國家都會不斷盡力的控制國內的通貨膨脹，使穩定化的政策得以有效施行。
- 三、西方外援對國內穩定化帶來的影響。在這裡我們所指的西方外援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西方所提供的貸款、西方轉型知識的指導和對經濟改革政策所提出的目標和條件等。由於轉型國家的穩定化會對國內通貨膨脹造成影響，而過高的通貨膨脹又會影響到經濟表現，當經濟表現不佳時，西方國家與金融組織便會終止對轉型國家所提供的貸款，或是進一步的提出更嚴厲的經濟改革條件與目標。此外，由於外資通常以國際金融組織的態度爲其進駐資金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西方的外援不但會影響到外資的多寡，也會牽動西方國家與金融組織機構在權力均衡三角中的互

¹³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2000)，p. 6-7。

¹⁴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pp. 7-8。

動，因而影響穩定化的執行與延續。

上述的權力均衡三角、通貨膨脹與西方外援的因素，構成了本論文討論的重點。以俄羅斯和阿根廷經濟轉型期間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並以影響穩定化的因素及其所帶來的結果當作分析的主題，描繪出整個框架。雖說俄羅斯和阿根廷的經濟轉型過程及表現都不是可圈可點，也不足以成為經濟轉型成功的典範，但筆者希望透過對這兩個南遠北轍，前社會主義與前軍政府威權體制國家經濟轉型穩定化表現的分析與研究，歸納出其中影響穩定化的變項。而且，阿根廷的經濟轉型向來在學界缺乏研究，因此期盼透過本文的分析與研究來為阿根廷的經濟轉型提供解釋與構作理論，並從經驗事實中得到驗證與發展。

第二節 文獻述評

在研究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我可以發現，由於俄羅斯是一個前社會主義經濟轉型到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典型例子，因此透過各種假設和各個層面研究俄羅斯轉型的文獻有許多。但相對阿根廷，除了身在偏遠的南美洲外，再加上其在全球經濟活動中所佔有的比重是微乎其微，因此向來乏人問津，所以關於阿根廷轉型的研究大多從歷史層面或文獻分析的層面進行探討，因此筆者盡量以第一手資料為主要參考文獻，對阿根廷的經濟轉型與發展做出研究與分析。但為了讓阿根廷的轉型研究能有更多的面向，筆者也試圖將各家的理論學說運用在阿根廷的例子，以辯証其可行性與否

目前研究國家經濟轉型的文獻大致上可分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理論解釋。而制度一般是指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用以有效約束人類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的行為。¹⁵因此制度在一個社會中主要的作用，是建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未必是有效率的)，以降低不確定性。¹⁶對轉型經濟的制度解釋是用政治和經濟制度來說明為何不同的轉型經濟會有不同的表現。非制度性的解釋則是以政經制度以外的因素作為主要的自變項變項，來解釋經濟表現，其中包括：文化的條件和經濟發展的程度。制度性的解釋則包含五個最主要的面向：改革前的制度(pre-reform institution)，總體經濟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ies)，經濟體制改革的速度(speed of reform)，財產權的結構(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和政權形式(regime type)。¹⁷

¹⁵ Douglass North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1994)，pp. 7, 10。

¹⁶ 李金紅，雷國新，「制度分析的回歸與演進」，*江西社會科學* 9 (2002): 6。

¹⁷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1996)，p. 6。

非制度性的解釋

文化條件

在研究轉型經濟中，文化條件的非制度性解釋，也曾被提出。因為東亞國家經改的成功，所以儒家文化的思想，遵循其道德的準則和理論的規範、重視教育、強調勤儉樸實、服從領導等論點都被認為是促成經濟成長的有利條件¹⁸，而這樣的論點在中國大陸和越南¹⁹的經濟改革例子上也顯得似乎相當具有說服力。而俄羅斯文化相對就被認為是不利於發展的，因為俄國人民自沙皇時期到共產時期，都不斷的備受壓抑與束縛，因此自然沒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文化養成，所以在面對突然放寬的自由放任市場也就相對無從適應。雖然從文化的角度切入剖析轉型國家的改革，在大陸、越南、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等例子上能夠規範出某些變項。但從俄羅斯與阿根廷的地理與歷史文化進行剖析，則會發現阿根廷相較於俄羅斯在地理位置上離西方國家較近，而在歷史上阿根廷受到西班牙殖民的統治下，相對也較受到西方的文化及資本主義文明的薰陶，因此就文化條件而言，阿根廷對市場開放和經濟自由的轉型應比俄羅斯適應的許多，所以應該可以導出較好的經濟表現，但顯然在阿根廷的例子，文化的理論似乎無法得到呼應。由此可見，從文化的條件出發做為解釋決定國家經濟表現的因素，似乎顯的較為不足。而且，制度是可以選擇性的調動或壓抑文化的，所以透過制度變遷的途徑解釋經濟表現，應該較為貼切。²⁰

除此之外，在俄羅斯的傳統政治文化下也演進了另一種研究途徑，克里姆林宮的政治研究途徑(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²¹，透過傳統的克里姆林宮權力鬥爭與政治文化主導俄羅斯的政治遊戲規則下，領導階層對如何解決經濟、社會、以及更廣泛的政治問題都會向對該政策具有影響力之各界勢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及各部門之

¹⁸ Gilbert Rozman, "The East Asian Re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Gilbert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¹⁹ 關於越南的經濟轉型，參見 Yu-Shan Wu and Tsai-Wei Sun, "Four Faces of Vietnamese Communism: Small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Choice under Hegemon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1, no. 4 (December 1998), pp. 381-399。

²⁰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p. 8。

²¹ 此一學派崛起於 60 年代，詳細內容參見 George W. Bresalauer, *Khrushchev and Brez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個人或派系，不斷進行意見溝通、政策辯論以及利益交換等活動。在此過程中所運用的派系聯盟、政策辯論、說服技巧、鬥爭策略、以及妥協技術等，統稱為克里姆林宮政治(Kremlin Politics)。目前，雖然蘇聯已經瓦解，但長久累積、發展下來的政治文化依舊存在現今的俄羅斯政治核心內部，因此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中，隱含著利益衝突與權力鬥爭的面貌。²²俄羅斯領導階層在受到政治現實的影響之下，便會對國內經濟政策走向產生搖擺，但經濟表現也會反過來影響政治勢力的消長²³。

透過克里姆林宮的政治研究途徑的確可描繪出領導階層對經濟改革政策產出的影響及過程，但由於近年來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注入了新的變項－西方國家與金融組織，因此筆者以為，若能將西方國家納入為主要的行為者之一將會更符合現實。

經濟發展程度

經濟發展程度理論認為，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已充分工業化和都市化)，在追趕先進國家時，其學習成本上比落後國家較高。這是因為落後國家可以直接採用較先進國家的生產技術，而加快了經濟成長的速度；但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因為經濟成長的空間有限，反而較為緩慢和受到限制。根據此論點提出的另一種論證表示，轉型國家是否擁有龐大的農業部門也能影響國家經濟成長的速度，因為農業部門的改革比起工業部門的改革較為簡易，且收益較快，因此也有助於國家總體經濟表現的成長。而工業規模較大的國家，在進行改革時除了收益慢，成本高，再加上牽涉到較多人的利益，因此受到一般官僚和民眾的阻礙也較多。此外，較落後國家擁有較多的小規模經濟活動因此經濟改革也較容易成功，因為傳統的小規模經濟活動比較容易重新振興復甦起來。²⁴在俄羅斯的例子，這樣的理論似乎有其道理，因為俄羅斯在推動經濟改革時，就無法佔有這樣的優勢，因為俄羅斯擁有大規模工業生產能力，使經濟成長的空間受限。但在波蘭²⁵和捷克²⁶的例子，由於這兩個國家的工業發展程度又比俄羅斯更

²² 王定士，「俄羅斯金融寡頭在民主化與經濟改革的角色：1992-1999」，*俄羅斯學報* 1 (2001): 22-23。

²³ 王金雄，*論俄羅斯聯邦的經濟改革：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七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1996)。

²⁴ Andres Aslund, "Soviet and Chinese Reforms--Why They Must Be Different," *The World Today*, vol. 45, no. 11 (November 1989).

²⁵ 關於波蘭的經濟轉型，詳情請參見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1996)，pp. 149-182。

²⁶ 捷克的經濟轉型，參見王宗德，*捷克與斯洛伐克經濟體制轉型比較(1990-2001)*

高，但其經改後的結果卻比俄羅斯好，所以經濟發展程度的理論在此似乎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此外，在阿根廷的例子，似乎也出現了矛盾，因為阿根廷國家向來是以進口替代和農業生產為其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龐大的農業支持下，再加上工業的落後，經濟改革應該能夠相當成功，但在阿芳辛時代，此理論顯然未得到印證。而到了美能時期，國內總體經濟的確有不錯的表現，因為經濟是在很低的水平起步的²⁷，但阿根廷的經濟成長也只有在一年曾經出現過兩位數的成長表現，之後就不再有了。而且阿根廷的經濟改革並無法造就最後的成功，目前俄羅斯的經濟表現顯然比阿根廷好得多。所以，經濟發展程度的理論似乎無法有效解釋阿根廷的經濟轉型現象。

制度性因素

改革前的制度

許多學者在討論經濟轉型前都認為改革前的體制對經濟轉型的過程及其結果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當一個國家經濟轉型前的制度越向中央靠攏，受到中央的控制越多，就越容易造成之後改革上的困難。²⁸而俄羅斯在蘇聯時期就是一個組織單一化，決策權力集中，地方缺乏自主性，對改革措施的反映很遲鈍；各部門、區域和企業的專業化程度很高，彼此之間的協調有賴中央官僚體系的國家。所以一旦中央的協調機制失效，整個體系都會出現崩潰的危機。²⁹因此在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下產生了一連串的弊病，如：龐大的國有體制，因而造就了一批既定利益經理人和普遍勞工，抗拒改革以防其自身利益受損³⁰；和長期畸型的經濟結構未能轉變的經濟增長方式，使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初期充滿了摩擦、矛盾與衝突。³¹而相較於阿根廷

(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2003)。

²⁷ Daniel Muchnik, *Argentina Modelo: de la Furia a la Resignación* (阿根廷模式:從狂暴到屈服-1973 年到1998 年之間的經濟與政治) (*Economía y Política entre 1973-1998*) (Buenos Aires: Manantial SRL, 1998).

²⁸ Stanley Fisher and Alan Gelb, "Issue in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Economies," in Vittorio Corbo, Fabrizio Coricelli and Jan Bossak, eds., *Reforming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Initial Result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1991), p. 70.

²⁹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p. 13。

³⁰ 參見 Jan Winiecki, *Resistance to Change in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 Property Right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1991)。

³¹ 關雪凌，*俄羅斯社會轉型期的經濟危機*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p. 66。

改革前的經濟，雖然阿根廷是一個從威權體制管理，國家過度干預管控經濟市場，進口替代嚴重的國家，但阿根廷國家中央集權的程度遠不及俄羅斯的嚴重，因此經濟改革應該可以非常順利，成功轉型；但顯然在阿根廷的例子似乎並非如此。因此，筆者以為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的例子，轉型前的制度顯然並不是真正決定經濟轉型表現優越與否的原因。

總體經濟政策

第二個制度面的因素則是國內的總體經濟政策。在不變動產權結構下進行調節社會的總供需，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由於總體經濟政策的趨向通常不是「擴張」就是「收縮」，因此，政府大多透過對經濟各項參數的調控進而達到經濟加速成長，或是抑制過度成長、平抑通貨膨脹的目的。³²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轉型例子中，總體經濟政策對轉型國家的經濟效益都是一個相當被受討論的議題，因為在葉爾欽與阿芳辛時期，其國內的國會、民意和企業組織(在阿根廷的現象中尤其是工會組織)，都傾向政府採取擴張的經濟政策，改善人民生活現狀；但西方經濟學者和與信服 IMF 傳統治療方法的政府官員與學者們則倡導緊縮的總經政策，以改善國家的財政赤字，降低國內的通貨膨脹。因此瑞典著名的經濟學家 Anders Aslund 就認為俄羅斯主要的經濟問題是源自於國內的總體經濟政策無法得到政治的基礎，以維持它的穩定性³³，所以在上述兩種壓力的拉扯下，國內經濟政策就在寬鬆與緊縮之間擺盪，使俄羅斯的經濟政策顯得軟弱無力，而破壞了財政經濟所需的穩定。³⁴反觀阿根廷的狀況，在阿芳辛的經濟改革過程中，西方所開出的主要總體經濟條件大概都是對通貨膨脹的控制、賦稅制度的改革、財政赤字的縮減和貨幣的貶值³⁵，但這些由西方所開出的經濟政策皆受到國內反對黨和工會的反彈與壓力，使施行西方經濟改革的過程時出現了半執行半排斥的現象，而阻礙了政策的持續。³⁶而到了美能執政時期，阿根廷的總體

³²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2000)，pp. 27-28。

³³ 參見 Anders Aslund, "The Politics of the Economic Reform: Remaining Tasks," in Anders Aslund ed.,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at Ris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87-205。

³⁴ 參見 A.B.烏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譯，*期待危機：俄羅斯經濟改革的過程與矛盾*（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³⁵ 參見 Luigi Manzetti,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the Argentina Case* (New York: Praeger 1991)。

³⁶ 阿芳辛時期的政治經濟改革過程，參見 Tedesco Laura, *Democracy in Argentina: Hope and Disillus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經濟政策在匯率政策的施行下，被認為是有效的穩定了市場、壓制了通貨膨脹、提高了生產率和改善了投資環境，使阿根廷的經濟出現穩定成長。³⁷可是執行了 10 年的匯率政策，到了德拉魯阿時期還是崩潰。但在德拉魯阿執政期間，國內的總體經濟政策並無太大的變動，德拉魯阿也一再堅決表示捍衛匯率政策的決心和堅持緊縮銀根的政策³⁸，可是國內經濟不但沒有好轉，反而在一連串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不堪一擊，為阿根廷帶來更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穩定的總體經濟政策可以帶動國內經濟的成長，但是總體經濟政策並無法完全解釋阿根廷延續匯率政策依舊崩潰的現象，而也無法解釋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所造就的產業扭曲現象，因為在擁有穩定的總體經濟政策後，國家應該立即進行結構性的改革，若無搭配適合國情的完善結構性改革，經濟轉型依舊無法成功。所以需先有穩定的總體經濟政策，之後再配合完善的結構性改革；而若是無穩定的總體經濟政策，就算有完善的結構性改革，政策也無法持續，國內的總體經濟表現也自然無法改善，經濟的轉型自然也就無法得到成果。

經濟體制改革的速度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文獻中，經濟改革的速度自 1989 年夏天於波蘭開始，針對到底是採用「震盪療法」或是「漸進療法」(gradualism)較利於國家進行經濟轉型的爭議就一直持續不斷。贊成震盪療法這一方認為經由「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來催生新制度擺脫舊制度，由國家主導，以詳細清晰的經改藍圖為指標，全方位的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前進，不但可以減短經改的陣痛期，也可以表示領導人的決心。而贊成漸進改革的人士則認為震盪療法忽略了制度的演進是緩慢的，而且經濟改革的初期，光靠市場的力量任其自由發揮供需機制，是無法有效達到資源被充分配置的。所以只有在舊有的體制下，以漸進的方式推動經改，才可以避免較大的社會成本與引導出成功的改革。³⁹但無論是以最快震盪的速度向資本主

³⁷ 參見黃星群，「阿根廷經濟呈現穩定上升趨勢」，*拉丁美洲研究* 1 (1994): 42-45。

³⁸ 方旭飛，「阿根廷經濟形式惡化的徵結何在？」，*拉丁美洲研究* 1 (2002): 20-25+64。

³⁹ 關於震盪與漸進經濟改革之爭，參見 Ben Slay, "Rapid versus Gradual Economic Transition,"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3, no. 31 (12 August 1994); Ronald I. McKinnon, "Gradual versus Liberaliz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cs,"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4), with comments by Anders Aslund, and Jacek Rostowski; 蔡金魁，*東歐：轉軌中的市場經濟* (北京：武漢，1997)。

義市場經濟轉型或是以較為溫和漸進的方式進行經濟轉型，都有成功的例子(震盪療法 - 捷克、波蘭)(漸進療法 - 匈牙利)。⁴⁰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中，雖然改革的政策是建立在震盪療法的基礎上，但俄羅斯的經濟表現依舊無法好轉，因為實際上俄羅斯的改革應該說只有震盪而沒有治療⁴¹。此外，由統治經濟轉型到自由經濟的過程中，所施行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速度是不可能一致的。通常私有化所需耗費的時間較長，因此容易造成國有企業產權還沒有變動，而市場已經自由化，價格已經開放的情形。而在這樣市場社會主義的環境下，對國有企業的硬預算自然無法有效緊縮而帶動通貨膨脹的高升。⁴²所以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若是無進行結構性的改革，搭配完善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財產權的配置，經濟轉型的成果依舊遲遲無法到來。

財產權結構

財產權是指一套經由國家執行，關於特定生產工具的人際間法律關係。而在這之中有四個要點：第一，人與人之間關於財產的關係，以防阻他人干預財產權的所有者行使其權力。⁴³第二，產權的執行有賴國家的強制力量來維繫。第三，財產權的所有者可能是自然人或是法人。第四，財產是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個人所有物(personal possessions)並不包括在內。而財產權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收益權(income power)(也就是所有權 ownership)和控制權(control power)。收益權指的是獲得和處分財產權所得的權力。控制權則是使用生產工具的權力。由於財產權的配置會影響到經濟制度，並決定生產工具如何被使用及利潤的分配。所以，產權的配置基本上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長久以來所爭論的焦點。就產權的角度而言，國家可以透過四種方式對國民經濟產生影響：一，統治經濟(command economy)，國家同時擁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二，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國家對企業有所有權，但沒有控制權；三，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私人有所有權但國家有控制權；第四，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私人同時擁有所

⁴⁰ 東歐經濟轉型，參照 Marie Lavigne,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9)；關於匈牙利經濟轉型，參照蔡金魁，*東歐：轉軌中的市場經濟*

⁴¹ Marie Lavigne, p. 120.

⁴²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p. 20。

⁴³ R. S. Bhalla, *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Legally, Histor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Regarded* (Lucknow, India: Eastern Book, 1984), p. 3；轉引自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p. 27。

有權與控制權。⁴⁴

所有進行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進行國內的經濟改革都意識到只有讓市場發揮其自然的機制，才能夠真正降低交易費用，使資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因此主要所採取的方向便是向私有化(privatization) - 將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轉移到私人手中，和市場化(marketization) - 將生產工具的控制權轉移到私人手中。而進行改革的第一步便是施行初步的市場化，但由於這種改革通常沒有伴隨私有化同時進行，所以是由統治經濟走向市場社會主義。而這樣的過程中難免引來國內的通貨膨脹，所以必須搭配緊縮的總體經濟政策。但緊縮的總經政策又會加劇所得分配的差距，導致最後初級市場化的失敗。而當國家調控市場不當，無法減緩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國家便會放棄調控市場，讓市場自由發揮供需機制，以有效配置經濟資源。但在進行完全市場化(complete marketization)卻沒有與私有化配套，國內的通貨膨脹便會更加高漲，所得分配也會更加惡化，因而影響了經濟改革的穩定性。⁴⁵在阿根廷阿芳辛的經濟改革中，國家的經濟政策方向就是在初級的市場化與完全的市場化中游離因而導致經改的失敗。⁴⁶而相較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便是同時推動市場化與私有化，從統治的經濟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移動。但由於市場化和私有化進行的速度不可能一致，因此往往會產生經濟改革難以與結構改革配套的問題。導致最後計畫無法有效施行，故無法達到原先所預期的效果。⁴⁷

政權形式

政權形式也會影響產權模式選擇的偏好。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下，認為社會生產分配秩序的私有化是人之異化與階級分化的主要根源。而自由競爭的資本發展與資本的累積，結果便是造成危機。⁴⁸所以傳統的共產黨政權都視私有化為革命的目標，因此在蘇聯時期的經濟改革都以市場化做為結構性經濟改革的走向。⁴⁹而關於政權形式的

⁴⁴ 關於財產權的途徑，請參照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第二章。有詳盡的解說。

⁴⁵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pp. 39-40。

⁴⁶ Tedesco Laura, *Democracy in Argentina: Hope and Disillusio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⁴⁷ 關於俄羅斯政治及經濟轉型，參照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⁴⁸ 參照楊世雄，*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台北：五南，2001），第六、七章。

⁴⁹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 7, 17, 21.

理論，在中國也延伸出「新權威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認為國家在開明的威權體制下推動經濟改革可以排除來自社會的阻力，使經濟改革的政策能有效施行，而這是民主政體所無法有的魄力。⁵⁰若從此一角度來探討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則可以發現民主體制似乎成為阻礙葉爾欽推動經濟改革的一大阻力，而在阿芳辛的經濟改革中似乎也受到國內民主的制肘。但不同的民主下，又有不同的憲政制度，因此也會帶來不同的變項。到目前為止，關於威權體制或民主體制可以引導出較好的經濟改革表現依舊存有爭議。

⁵⁰ 關於新權威主義，參見齊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台北：

第三節 分析框架

研究架構

透過上述的文獻分析，雖然為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轉型提供了許多假設，但似乎無法完全解釋俄羅斯或阿根廷經濟改革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因此在此我們將引用國內學者吳玉山在其*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書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國際金融組織、俄羅斯政府、與俄羅斯國會的三邊關係做為本論文的分析框架。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模式，並且包含了國內和國外的因素。在這個框架中，主要的行為者有三個：由西方所支持的國際金融組織、政府、和國會。因為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的例子中，雙方都是依照西方國家的經改理念，向穩定化的大方向去推動其國內的改革。但實際上，三位行為者的偏好各不相同，而它們的相對勢力也隨著國內的選舉週期而改變。西方和國際金融組織要求俄羅斯與阿根廷當局採用激進的改革策略，帶領國家經濟走向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而在葉爾欽時期的俄羅斯及阿芳辛時期的阿根廷，由於國會大多受到反對黨的控制，因此國會反映民意，希望國家拯救企業、保障就業、維持物價安定、縮短所得差距，與西方的偏好產生了拉拒，但到了普欽(Vladimir Putin)與美能執政期間，因為國會多數是屬執政黨或支持執政黨的，因此在這段期間，國會的偏好與政府能夠產生一致性的共鳴。至於葉爾欽政府與美能政府對國內經濟改革的態度基本上是希望能夠推動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而阿芳辛則較偏向穩定其政權，安撫國內反對的聲音，因此經濟改革只是穩固其政權的附屬品。但無論是哪一位執政者的政府，其最主要的考量還是維持政權，吸取選票，也因此政府受到選舉週期的決定性影響。這樣的現象在葉爾欽與阿芳辛時期的政府更是表露無疑。俄羅斯與阿根廷政府處在國際金融組織和國會之間，受到方向相反的交叉壓力。由於選舉週期的關係，國內、國外的因素對於政府政策的相對影響力經常改變。大凡選舉時國內壓力增加，政府政策向左傾；而選舉之間(選間期)國際的壓力則大增，政府的政策就向右傾。透過一個這樣的解釋框架，我們發現一個強勢的政府較能有效維持政策的穩定性，而帶動國家經濟的發展。因此葉爾欽與阿芳辛國家經濟問題的根源根本就是在於不良的制度結構，使政府的總體經

唐山出版社，1991)。

濟缺乏方向，不斷的隨著選舉週期而左右擺盪。⁵¹而在這種扭曲的制度環境下，經濟改革的成功自然無法到來，因此無法滿足人民的期望。⁵²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我們也可以發現美能時期的阿根廷問題，根源並不是起於西方或國會，使其穩定化政策無法有效施行，而是出在制度結構的不良，使阿根廷經濟顯的外強中乾，而在一連串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無法招架，導致最後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性的崩潰。

爲何葉爾欽與阿芳辛在施行經濟改革時國內的通貨膨脹遲遲無法得到控制？通貨膨脹無法降低通常是受到穩定化無法有效執行所導致。而葉爾欽與阿芳辛的經濟表現便是受到政治週期的影響在寬鬆與緊縮的政策下擺盪不定，使國家經濟無法得到穩定，通貨膨脹也就自然無法得到控制，而過高的通貨膨脹卻又阻礙了經濟的成長，無法有效改善國內總體經濟的表現，西方國家的外援自然就無法供給，而再度回歸影響到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和國會的權力均衡。這樣惡性循環就一直重複著，而葉爾欽與阿芳辛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葉爾欽執政了 8 年也無法替俄羅斯交出亮麗的成績，而阿芳辛執政了 6 年也無法有效領導阿根廷走出經濟的沼澤。但這樣的循環也可以是良性的，在美能執政的 10 年當中，由於其強勢的作風與國會的支持，使國家的經濟改革未受到政治週期的影響而搖擺不定，穩定化的政策能夠有效執行，因此通貨膨脹也得到控制，經濟表現也逐漸轉好，而西方的外援自然也就不斷湧入。但美能卻未把握這黃金時間，致力於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建與本土產業的發展，一味依賴外資，一旦受帶外來衝擊，外資大量抽離資金時，國家便無法承受外來的打擊，導致最後經濟的崩解與社會的動盪。

⁵¹ 參見第五章圖 5-1，「俄羅斯葉爾欽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的擺盪」；和第五章圖 5-2，「阿根廷阿芳辛時期經濟轉型中的權力均衡與經濟政策的擺盪」。

⁵²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pp. 32-33。

第四節 章節安排

在本文的第一章當中，透過研究動機闡述目前俄羅斯與阿根廷的經濟概況，此外也提出為何會將俄羅斯與阿根廷放在同一個天秤上做比較的共同點及差異點。而透過研究目的，說明本論文試圖回答的問題，而最主要的核心還是擺在俄羅斯與阿根廷經濟轉型的穩定化表現及影響穩定化的因素。在文獻分析的小節中，筆者指出制度性及非制度性的理論在解釋俄羅斯及阿根廷經濟轉型中的可行性與否，由於眾多的理論都無法為俄羅斯及阿根廷經濟轉型的困境描繪出一個完整的框架，因此筆者採用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模式，其中包含了國際金融組織、俄羅斯政府、與俄羅斯國會的三邊關係做為分析俄羅斯的框架，再套用在阿根廷的經濟轉型上，做為本論文的分析框架。在第二章，我們透過歷史的層面及文獻的分析，描繪出前蘇聯與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歷史背景。其中包括對政治和經濟的面向做出概述，而主要的焦點將放置在戈巴契夫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及阿根廷軍政府威權統治下的政治情況和經濟改革上。在對兩國國內的政治及經濟歷史背景有了概擴性的了解後，第三章我們將導入本論文的核心，俄羅斯及阿根廷經濟改革的過程，透過政治週期論述國家領導人與國內經濟穩定化之成效的關係。同時，在探討的過程中將看到權力均衡分析框架的印證。俄羅斯方面以葉爾欽和普欽(1991~2002)的經濟改革為主，而阿根廷方面則以阿芳辛、美能與德拉魯阿(1983~2002)為討論的範圍。第四章的討論重點將擺在與穩定化息息相關的通貨膨脹和西方外援上。本章試圖回答為何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兩國的通貨膨脹無法得到控制？穩定化如何影響國內的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又如何影響到國家總體經濟的表現？另外，受到總體經濟表現影響的西方外援如何在俄羅斯及阿根廷的經濟改革中發揮其影響力，牽動了權力的均衡？這些都將在第四章當中做出分析。在第五章的結論中，我們將歸納出俄羅斯及阿根廷領導人、國會及國際金融組織之間三邊之間的權力均衡的關係。同時闡述權力均衡、穩定化、通貨膨脹、國家總體經濟表現及西方外援之間的關聯。在這樣的章節安排下，希望能夠對一個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南美前軍政府威權體制國家的經濟轉型，找出適當的解釋理論。